

留学与建设

李 鹏◎著

——新中国初期
留苏教育研究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留学与建设 ——新中国初期 留苏教育研究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内容提要

留学工作极大地影响着一个国家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的提升。20世纪以来的留学热潮构成了波澜壮阔的“索我理想之中华”的奋斗史,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本书分六章,分别介绍了新中国开启留学教育的背景、新中国开启留学教育的历史考察、新中国留苏教育的全面展开、新中国留苏教育的延续和终结、新中国留苏学生研究、新中国留学教育的历史评价,在系统梳理前任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大量挖掘使用教育部、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市档案馆的原始档案材料,全景式地展示了新中国初期留学苏联的历史进程和深远意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留学与建设:新中国初期留苏教育研究 / 李鹏著. —上海:上海交

通大学出版社,2016

ISBN 978 - 7 - 313 - 15326 - 5

I .①留… II .①李… III .①留学教育-教育史-研究-中国-现代

IV .①G649.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50382 号

留学与建设——新中国初期留苏教育研究

著 者: 李 鹏

出版发行: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邮政编码: 200030

出 版 人: 韩建民

印 刷: 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字 数: 283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书 号: ISBN 978 - 7 - 313 - 15326 - 5/G

定 价: 48.00 元

地 址: 上海市番禺路 951 号

电 话: 021 - 6407120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张: 15.25

印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告 读 者: 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联系电话: 0769 - 85252189

前　言

近代中国留俄(苏)教育研究综述

从 1872 年清政府派遣幼童留美开始,近代中国开启了“开眼看世界”的留学热潮。按照戴逸和宋健的划分,从官派幼童留美算起,100 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经历了十代留学潮:第一代留学生是 1872—1881 年 120 名官派留美幼童;第二代是光绪初年(1877 年)派出赴欧洲各国学习海军的近百名留学生;第三代是 20 世纪初的留日学生;第四代是 20 世纪初的庚款留美生;第五代是 20 世纪 20 年代勤工俭学的留法学生;第六代是 20 世纪 20 年代留苏学生;第七代是 1927—1937 年的留学生;第八代是 1938—1948 年赴欧、美留学生;第九代是新中国五六十年代的留苏学生;第十代是改革开放之后的留学生^①。按照王辉耀的划分,近代中国曾出现五次留学热潮:第一代留学生怀揣富国强兵之梦;第二代留学生充满热血革命的理想;第三代留学生有着科技救国的执着;第四代留学生肩负建设祖国的使命;第五代留学生充满创业立业的热忱^②。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欧美同学会成立一百周年的大会上明确指出:“以留日中国学生等为骨干组建中国同盟会,毅然发动和领导辛亥革命。……旅欧勤工俭学和留苏学习的进步青年相继回国,在火热的斗争中成长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建立了不朽功勋。……面对新中国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的困难局面,一大批留学人员毅然决然回到祖国怀抱,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呕心沥血、顽强拼搏,为新中国各项事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取得了‘两弹一星’等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大批留学人员远赴苏联、东欧学习,成为我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重要力量。……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作出了扩大派遣留学生的战略决策,推动形成了我国

^① 戴逸.中国留学教育的光辉道路(《建国初期留学生归国记事(代序)》)[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2—3.宋健.百年接力留学潮[N].光明日报,2003—4—15.

^② 王辉耀.海归时代[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2.

历史上规模最大、领域最多、范围最广的留学潮和归国热。”^①总之，无论以什么标准划分，近代中国的留苏（俄）教育都是独立而重要的一个历史发展阶段，在近代中国留学教育的历史长河中占有一席之地。

一、19世纪中国留俄教育研究综述

派遣留学生是近代世界各国为促进相互了解，加强文化交流，培养和储备高层次人才而实施的战略性举措。1872年8月11日，首批30名幼童从上海乘船驶向美国旧金山，开启了近代中国留学国外的先河。此举在当时被称为“中华创始之举，古今未有之事”^②。以此为开端，此后100多年里，中国人出国留学的热潮绵延不断。在几次留学大潮中，起始于清末，贯穿于整个20世纪的赴俄（苏）留学热潮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也越来越引发学术界和社会各方面的高度关注。

近代中俄教育交流发端于中俄外交的需要。相对于18世纪沙俄为了扩张而急需加强对中国的认知而言，正处于“天朝上国”时期的清政府却没有多大的反响。虽然在这一时期，清廷地方官员不断提出派遣留俄人员的动议，但都被清政府拒绝了。1735年，镶蓝蒙古旗副都统多尔济，针对俄罗斯文馆教学成效并不显著的问题向清廷奏议：“由俄罗斯学校少年内，拣选学习略懂者四名，与今来之俄罗斯使臣同遣，勤习伊等语文三年而回。如此，翻译由俄罗斯国来文，不致遗谬。”^③直到清朝同治、光绪年间，中国留俄教育大幕才徐徐拉开。

关于这段历史，大多数研究人员所搜集和引用的史料来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清末史料。出版的文献中，值得关注的有朱有璫主编的《中国近代学制史料》（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和王焕琛主编的《留学教育——中国留学教育史料》（台北“国立编译馆”1980年版），特别是后者引用的留俄学生监督章祖申《呈留俄学生学务报告》最有研究价值，其对清末留俄教育的整体情况、留学学校、学制、专业和留学生等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总结，被研究者多方引用和转述。此外，黄利群主编的《中国人留学苏（俄）百年史》，陈学恂、田正平主编的《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留学教育》，林子勋编著的《中国留学教育史（1847—1975年）》也涉及晚清留俄教育的一些情况。

刘振宇通过对档案文献的研究认为，从1866年清政府派出第一个赴俄考

^① 习近平.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EB/OL].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0/21/c_117808372.htm.

^② 陈学恂,田正平.中国近代教育资料选编——留学教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374.

^③ 刘振宇.清末民初中国人留学俄(苏)活动的历史考察[J].俄罗斯研究,2013(1):188.

察团,3名京师同文馆学员“随使游历”开始,发展到19世纪末期的“住馆肄业”^①,开启了官派留俄学生的历史先河。到了20世纪初,光绪皇帝先后两次下旨,要求留学生从专门学习语言文字向学习其他专业转换,并诏令各省给予一定经费支持。从此之后,各地方政府纷纷加大派遣留学生力度。刘振宇通过对清史档案和俄罗斯及台湾地区等地相关文献档案的整理基础上,统计出了20世纪初清政府官派留俄学生的基本情况。对晚清时期中国留俄教育的原因概括为中俄交涉增多、中国废科举、俄国教育发展和同文馆的作用。与此同时,通过对清末民初留俄学生的分析,张泽宇指出此次留俄教育的特点是:人数少、规模小;官派为主;地方选派为主;学生知识层次较高;所学专业以工科和法政为主^②。

二、20世纪二三十年代留苏教育研究综述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为饱受列强欺凌的近代中国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和道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知识精英,以赴苏学习革命理论和军事技能为主要目的,掀起了近代留苏教育的第一次高潮。

国内对近代留苏教育的关注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张锡玲《东方大学中国班及其对中国革命的作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3期)、米镇波《赴苏俄留学述略(1925—1930)》(《党史纵横》1988年第4期)、于洪君《关于二三十年代中国革命者和青年学生赴苏学习的几个问题》(《苏联问题研究资料》1988年第6期)、黄新宪在《莫斯科“中大”、“东大”与国共两党留苏学生》(《理论学习月刊》1989年第3期)、戴学稷《走十月革命的道路——二三十年代的留苏浪潮与中国革命运动》(《内蒙古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4期)、琚忠友《论中国二三十年代的留苏浪潮》(《南京政治学院学报》1991年第5期)等文章是比较早的研究成果。这些文章中,有对中山大学和东方大学情况以及国共两党留苏人员学习生活情况的介绍,并对此次留苏教育进行优缺点评价;还有对留苏教育的原因和背景、留学人员情况、留学与国内革命的关系,以及留苏影响等方面的介绍。

在留学生研究方面主要有当事人的回忆录,如《肖劲光回忆录》和《杨尚昆回忆录》等。一些留苏当事人也通过撰写回忆文章追溯那段历史,如:谢怀丹《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生活回忆》(《党史研究与教学》1983年第8期)和路元《莫斯科中山大学女生寻踪小记》(《瞭望》1986年第9期)。除此以外,海外出

^① 刘振宇.清末民初中国人留学俄(苏)活动的历史考察[J].俄罗斯研究,2013(1):189.

^② 张泽宇.晚清留俄教育述论[J].河北学刊,2004(1).

版的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录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如:《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郑超麟回忆录》等。

20世纪90年代以后,近代留苏教育逐渐引发研究者的关注。周棉在《近代中国留学生群体的形成、发展、影响之分析与今后趋势之展望》(《河北学刊》1996年第5期)一文中,使用“留苏政治家群”来称谓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留苏学生。徐行在《中共第一代留俄生述论》(《中共党史研究》1997年第1期)一文中,对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派遣的第一批留苏学生时代背景、学生来源和构成、派遣过程、在苏联学习生活以及此次派遣的特点和影响,作了比较客观而细致的介绍。

21世纪伊始,近代历史研究和教育史研究领域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近代中国留苏教育,无论是从留学教育的历史进程,还是在留学生群体和个人研究领域都出现了一批有分量的研究成果。黄利群著《中国人留学苏(俄)百年史》(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孔繁岭著《中国近代留学史稿》(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李涛《借鉴与发展——中苏教育关系研究:1949—1976》(浙江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都单列章节介绍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留苏教育。

除此之外,裴超《“朝圣取经”的首批留苏中共党员》(《党史纵览》2012年第12期)对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派遣的首批留苏人员,从留学背景、留学基本情况和国外学习生活,以及回国贡献等各方面作了介绍。李里峰《中共中央领导层中的留学生群体分析(1921—1949)》(《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一文中,对中共中央领导层中的留学生群体和及其地位作了分析,特别是剖析了领导层中的留苏群体特征及其命运。马启民在《20世纪前半期中国共产党人留学生群体研究》(《人文杂志》2005年第5期)一文中对20世纪前半叶中国共产党留学生群体进行了代际划分,归纳其特点,即: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之信仰,锻炼了党性;通过系统学习和实践锻炼,学有所成;形成广阔视野的世界眼光;不足之处是形成了一定的教条主义理论并付诸实践。孔凡岭在《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共留苏教育及其特点》(《中共党史研究》2006年第3期)中对1927年后的中共留苏教育作了介绍,如东方大学的中国军事速成班及中山大学、列宁学院和其他一些学校的中共学员学习情况的介绍,最后总结了中共留苏教育在20世纪20年代末的特点,主要表现为强烈的革命色彩、苏联包办一切、严重的宗派主义等。李志学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旅俄(苏)留学运动始末》(《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9年第2期)中以20世纪20年代为时间主线,分为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旅俄(苏)留学运动、国共合作时期的旅俄(苏)留学运动,以及大革命失败后的旅俄(苏)留学运动三个阶段,叙述了国共两党或联合或单独派遣留苏学生的历史进程。

值得关注的是,张泽宇著的《留学与革命——20世纪20年代留学苏联热

潮研究》一书(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近 40 万字,全景展现了 20 世纪 20 年代留学苏联的情况;系统梳理了 20 世纪 20 年代国共两党联合派遣,以及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单独派遣留学生的情况,深度挖掘了留学苏联热潮的历史背景;把 20 世纪 20 年代的留苏教育放在中苏两国政治文化趋同与冲突的宏阔视野中进行研究;客观分析了国民党留苏学生对国民党执政的影响,如以蒋经国为例,分析了国民党留苏学生对国民党执政的影响;综合评价了中国共产党留苏学生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和贡献。以王明为例,论述了中国共产党留苏学生对 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革命的影响。该书以比较翔实的史料为基础,既有宏观历程叙述,又有具体人物剖析,史论结合,是目前已出版的研究 20 世纪 20 年代留苏教育的重要文献。

境外研究方面,苏联解体之前,苏联学者对东方大学、莫斯科中山大学分别做过专门的研究,还有学者将整个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人赴苏学习情况作为一个研究课题进行比较系统的研究,其成果主要刊载在《亚非人民》和《远东问题》学术刊物上。例如,俄罗斯科学院远东问题研究所于 1988 年、1991 年在《远东问题》上连续发表多篇论文,根据解密档案着重阐述了蒋经国在异域他乡的 13 年游学生涯。近年来,随着相关档案的解密,俄罗斯学界开始重视中国留苏(俄)教育研究。Д.А. 斯皮恰克所著《共产国际莫斯科教学中心中国学生培养史:目的、方式、结果(1921—1939 年)》(副博士论文,莫斯科 2010 年)、A. B. 潘佐夫的《苏中关系秘史·布尔什维克与中国革命(1919—1927)》(莫斯科 2011 年),都根据俄罗斯解密档案,专题论述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国留学生的情况,史料价值比较高。

台湾地区也展开了一些研究。刘真、王焕深编著的《留学教育——中国留学教育史料》(台湾“国立编译馆”1980 年版)详细汇编了晚清、民初和 20 世纪 20 年代留苏教育情况。《60 年来中国留俄同学之风霜踔厉》(中华图书出版社 1988 年版),汇编了国民党“留俄同学会”赴台人员的回忆录。台湾学者余敏玲的论文《俄国档案中的留苏学生蒋经国》《国际主义在莫斯科中山大学(1925—1930)》,以及博士论文《莫斯科中山大学(1925—1930)》(1995 年)详细介绍了莫斯科中山大学办学情况,以及国共两党留学人员留学情况。

三、新中国初期留苏教育研究综述

相对 20 世纪 20—30 年代的留苏教育研究已经取得的成果而言,新中国初期的留苏教育研究受到学者关注的时间比较晚,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研究越来越深入,成果也越来越丰富。李滔主编的《中华留学教育史录(1949 年以后)》在汇总教育部相关档案的基础上,重点介绍了新中国初期的留学政策和留

学规章制度。2006年欧美同学会留苏分会举办的留苏学子大型展览影响深远,画册《学子之路——新中国留苏学生奋斗足迹》史料价值极高。周尚文、李鹏主编的《新中国初期“留苏潮”的实录与思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在收集整理教育部档案馆、北京外国语大学档案馆等第一手档案资料的基础上,重点梳理了留苏学生的选拔、培训和派遣工作。田涛等主编的《中国留学通史》(新中国卷)对留苏教育的兴起、发展和中断,留学生的派遣和人数、专业、学校的统计,留学特点,留学生群体分析等作了梳理和介绍。单刚、王英辉著的《岁月无痕——中国留苏群体纪实》则重点记录了对几十位留苏学生的采访,具有较高的口述史料价值。张柏春等著的《苏联技术向中国的转移:1949—1966》一书中侧重介绍了科学院系统和科技人才留苏情况。李涛著的《借鉴与发展——中苏教育关系研究》在新中国初期中苏教育交流大背景下,专题介绍了留苏教育的发展。

在公开发表的论文方面,黄利群《建国初期留苏教育的历史地位评价》(《教育评论》2001年第2期),李涛《关于建国初期留苏教育的历史考察》(《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关于建国初期赴苏留学生派遣工作的历史考察》(《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关于建国以来中苏教育交流史研究状况的综合评述》(《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周尚文《新中国成立初期“留苏潮”评述》(《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2年第10期)等都从整体上介绍了新中国初期的留苏教育历史和一些评价。特别是周尚文、李鹏的系列文章《一种新的留学模式的开端——新中国首批(1951年)派遣留苏学生的历史考察》《建国初期留苏学生是怎样选派的》《建国初期留苏学生的国内培训工作》《建国初期留苏学生国外学习生活状况》《建国初期留苏学生对国家建设的贡献及历史评价》(载《历史教学问题》2007年第6期、2008年第2、3、5、6期)较为详细地从选拔、培训、派遣、国外学习生活、归国贡献等角度介绍了新中国初期留苏教育的历史发展。

在留苏学生群体研究方面,主要有欧美同学会留苏分会主编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忆留苏岁月》《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难忘的峥嵘岁月》,通过欧美同学会留苏分会这个平台,搜集整理了上百篇留苏学子的回忆文章,具有非常珍贵的史料价值。除此之外,团中央系统编辑的《“茨卡莎”留学岁月——苏联团校中央团校中国班学员回忆录》,钱其琛著的《外交十记》都谈到了团中央系统的留苏教育和留学生群体。除此以外,最为多见的是大量留苏学子的回忆录和描写留苏学子的纪实文章,如:邓守强《留苏岁月》(东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以作者个人的留苏(俄)经历,特别是新中国初期的留苏经历为主,把在苏联学习和生活情况比较详细的记录成书。军工系统、共青团系统、法学、美术、医疗卫生、出版、体育、语言、核工业、地矿、音乐、能源、航空、铁路、文

学艺术等领域的留苏学生也撰写了大量的回忆文章和纪实文章,如:徐世平《新中国首批海军军官赴苏留学忆往》(《档案春秋》2013年第7期)、涂通今《追忆留苏岁月》(《纵横》2000年第7期)、关昕《新中国首批法学家留苏前后》(《历史法学》2013年第2期)、张华清《留苏热潮与新中国美术》(《美术报》2013年3月9日)、朱训《阳光狂风雨露伴我行》(《纵横》2002年第3期)、赵永涛《我们见证了那份深情厚意》(《北方音乐》2006年第12期)、陈曦《傅志寰:那些火红岁月》(《留学生》2009年10月),以及周启澄、董玉珠、季方正、刘鸿儒、吕坪、阮可强、牟玲生、涂途、蔡正平、程斯煌、陆中林等留苏学子上百篇回忆文章。

此外,新中国初期的留苏教育也越来越引起国际社会和传媒界的关注。美国学者马薏莉的论文《两个革命之间:在苏联的中国留学生(1948—1966)》(《冷战史研究》2010年第2期)就将研究对象聚焦在新中国初期的留苏群体。此外,凤凰卫视、北京电视台和广东电视台等媒体围绕新中国初期的留苏学生制作了一批电视资料片,可看性甚强^①。

^① 如凤凰卫视、北京电视台分别制作了电视纪录片《唐人街——中国留苏学生故事》《五十年代留苏学子的往事》《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我的留苏岁月》等。

目 录

第一章 新中国开启留学教育的历史背景	1
第一节 “一边倒”外交战略和中苏同盟的建立	1
第二节 “全面学习苏联”及其影响	4
第三节 新中国初期建设人才短缺状况及缓解途径	7
第二章 新中国开启留苏教育的历史考察	14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早期留苏教育研究	14
第二节 新中国开启留学教育的历史进程	26
第三节 新中国开启留苏教育的历史考察	35
第三章 新中国留苏教育的全面发展	50
第一节 20世纪50年代中苏关系的发展	50
第二节 留苏预备部的组建、培训和派遣工作	53
第三节 20世纪50年代留苏教育的全面开展	74
第四节 20世纪50年代留苏教育的历史评价	88
第四章 新中国留苏教育的延续和终结	101
第一节 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的演变	101
第二节 全国留学生会议的召开和留学政策的调整	103
第三节 20世纪60年代留苏教育的延续和终结	107
第四节 20世纪60年代留苏教育的历史评价	116
第五章 新中国留苏学生的日常管理和服务生活	123
第一节 留学生管理机构的设立和日常工作	123
第二节 留苏学生的自我管理	130
第三节 留苏学生国外学习情况	133

第四节 留苏学生国外生活情况	148
第六章 新中国留苏群体研究	158
第一节 留苏群体概况	158
第二节 留学人数和获得学位问题研究	175
第三节 留苏学生归国贡献研究	180
结语	192
附表	196
参考文献	221
索引	226
后记	228

第一章

新中国开启留学教育的历史背景

新中国成立伊始,留学工作大致可以分为两方面:一是结束旧的留学制度,重点争取尚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留学生回国服务,团结境外高级知识分子参加新中国各项建设;二是开始新的留学制度,和一部分兄弟友好国家交换留学生。新中国政府创造一切便利条件,积极争取留学生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与此同时,根据新民主主义建设的实际需要,有计划地派遣新中国留学生到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学习先进科学技术,同时本着国际主义精神和文化交流需要,欢迎兄弟友好国家派遣留学生来华学习。

第一节 “一边倒”外交战略和中苏同盟的建立

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就开始思考未来中国的前途和命运问题。1949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结束不久,中共领导人在西柏坡接待了斯大林的特使米高扬。这次会晤促使中共中央最终决定实行“一边倒”战略。同年3月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总结发言中,毛泽东宣布:“我们与苏联应该站在一条战线上,是盟友,只要一有机会就要公开发表文告说明此点……关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承认问题……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①借此向党内高级干部提出了同苏联结盟的想法。同年4月,在同原国民党将领张治中的谈话中,针对张所提出的建国之后在美苏之间保持中立的主张(当时部分民主党派人士和知识分子对此持赞赏意见),毛泽东指出:“当今之世,非杨即墨,不是倒向苏联一边,便是倒向美国一边。”^②借此机会,毛泽东向国内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提出了“一边倒”战略

^① 毛泽东选集(4)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3.

^② 余湛邦.毛泽东与张治中的一次重要谈话[J].北京:中共党史研究资料(48).

的设想。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在文中毛泽东明确提出了新中国外交“一边倒”的战略。他阐述道:“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①可以说,毛泽东在此历史转折的重要时刻向全世界公开宣布,即将诞生的新中国要全方位地站在苏联一边,实行向苏联“一边倒”,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斗争中,将坚定地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

“一边倒”战略不是新中国一厢情愿的结果,这是由当时的客观历史条件决定的。1949年7月19日,当时正在华东指挥作战的邓小平在致华东局各同志的信中,对“一边倒”作了精辟的阐述,他讲道:“帝国主义的各种花样直到封锁,其目的在于迫我就范,我们的斗争也在于迫使帝国主义就范。我们绝不会就帝国主义之范,而一个多月的经验看出,帝国主义就我之范亦非易事。……在目前说来,虽增加我们不少困难,但对我仍属有利,即使不封锁,我们许多困难也是不能解决的。但封锁太久了,对我则是极不利的。……我们提出的外交政策的一面倒,愈早表现于行动则对我愈有利。”^②综合分析新中国初期选择“一边倒”战略,而且是主动倒向苏联,原因主要有:

第一,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格局发展的必然要求。1946年3月5日,时任英国首相丘吉尔在美国富尔顿发表了著名的“冷战”演说,1947年9月22—27日,以苏联为首的9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在波兰举行会议,并发表了《关于国际形势的宣言》,明确宣称战后在处理国际问题时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路线和政策,在国际政治舞台形成了两个完全相反和对立的阵营。美苏矛盾的加剧、两个阵营理论的出现以及新的国际格局的形成,迫使世界各主要国家必须做出自己的判断和选择。正如保罗·肯尼迪所说:“一个国家不站在美国领导的阵营内,便站在苏联领导的阵营内,不存在中间道路。在斯大林和乔·麦卡锡时代,那种走中间道路的想法是很不明智的。”^③

第二,它是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必然选择。自鸦片战争以来,由于帝国主义长期文化侵略的影响,不少人对美国的物质文明抱有幻想,期望美国能给中国经济的恢复和建设以物质援助,特别是一些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想借助美国的力量来抬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因此极力主张在美苏之间保持中立,以免得罪美国。中国共产党人在认真总结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历

^① 毛泽东选集(4)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5.

^② 邓小平文选(第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134.

^③ [美]保罗·肯尼迪著,王保存等译.大国的兴衰[M].北京:求实出版社,1988:455—456.

史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深刻地认识到中国革命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倒向社会主义阵营。由于中苏两党具有相同的意识形态信仰,中国共产党内曾一度把中国革命看成苏联领导的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一部分,所以有学者指出,中国选择“一边倒”战略,更重要的是中共意识形态上长期与苏联一致,都致力于反对国际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运动^①。但是国家利益考虑才是新中国真正选择“一边倒”的根本原因。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仍坚持敌视中共的政策,明确表示“不能同一个共产党政权打任何交道”^②,拒绝了双方改善关系的可能。有西方学者认为,新中国之所以实行“一边倒”政策,原因之一是中共领导人当时已经意识到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对中国革命的胜利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在毛泽东和他的同志眼里,正是因为帝国主义国家具有军事干涉中国的可能性,所以中国有必要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结盟。”^③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变本加厉地公开支持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极力阻挠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在外交上承认新中国,并在经济上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当时,只有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向新中国伸出了友谊之手。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四年中,同苏联、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签订的政治、军事、经济、科技、文化及其他各种专项协定和议定书等,共达 110 多种,而与其他国家订立的各种协定,总共才二三十件。由此可见,当时要从社会主义阵营之外得到援助几乎是不可能的。新中国同苏联和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签订的条约和协定,对巩固革命胜利的成果,对打破帝国主义孤立和窒息新中国的阴谋,对中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对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对维护远东地区的和平,都起了重要作用。

第三,它有利于消除斯大林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猜疑。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形成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领导核心,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对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一些错误主张进行了抵制,所以苏共和斯大林对中共一直是持保留态度的。1944 年 6 月,斯大林在与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的谈话中,称中共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而是“人造黄油”式的共产党。1948 年,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由于坚持自己的独立立场,被斯大林错误地开除出共产党情报局,苏联与南斯拉夫也中断了正常的外交关系。由此,斯大林对在中国革命中坚持自己独立立场的中国共产党更加敏感和警惕,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执行正确

^① Frederick C. Teiwes: The Establishment and Consolidation of the New Regime 1949 ~ 1957,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416.

^② 陶文钊.中美关系史(上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345.

^③ Chen Jian: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Chapel Hill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1: 50.

的统一战线政策,准备吸收一些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加新中国的政府工作,斯大林又怀疑中共会不会执行亲英美的路线。当时苏联驻华大使罗申随同国民党政府南撤广州,直至1949年5月30日才离开广州,在此之前一直明确保持着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关系。从这件事情也可以看出斯大林当时的担心。在此情况下,公开表明在两大阵营对峙的世界格局中,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采取“一边倒”的方针,以消除苏共与斯大林的偏见和疑虑,增强相互间的了解和信任,加强友谊和合作,是完全必要的。

内政决定外交,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同时也深刻地影响着一个国家的内政方针的制定和实施。“一边倒”不仅仅是新中国外交战略的核心内容,同时也深刻地折射出新中国国内政策的导向。作为对新中国“一边倒”战略的回应,苏联和新中国于1950年2月14日正式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是苏联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签订的第一个新型的双边关系条约,它表明中苏之间不仅是一个军事同盟,更是一个政治同盟。该条约加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的友好合作,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条约中规定了缔约国双方保证以友好合作的精神,并遵照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及不干涉对方内政的原则,发展和巩固中苏两国之间的经济与文化关系,彼此给予一切可能的经济援助,并进行必要的经济合作。

1950年4月11日,毛泽东主持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周恩来总理在会上作了《关于中苏条约的报告》,会议批准了这个条约。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我们是处在一种什么情况之下来订这个条约呢?就是说,我们打胜了一个敌人,就是国内的反动派,把国外反动派所扶助的蒋介石反动派打倒了。国外反动派,在我们中国境内,也赶出去了,基本上赶出去了。但是世界上还有反动派,就是我们国外的帝国主义。国内呢,还很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有朋友。……我们同苏联的关系,我们同苏联的友谊,应该在一种法律上,就是说在条约上,把它固定下来,用条约把中苏两国友谊固定下来,建立同盟关系。……帝国主义者如果准备打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请好了一个帮手。”^①

第二节 “全面学习苏联”及其影响

“一边倒”战略和《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苏新型国家关系的建立。以苏为首、以苏为师成为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口号和奋斗目标,“苏联

^① 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132.

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成了那个时代的最强音。新中国随即在全国范围内，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等各个领域掀起了学习苏联的高潮。当时，中国的上上下下皆把苏联称作“老大哥”，各行各业都要向苏联老大哥学习。这不仅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中苏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也对新中国本身的建设和发展产生了巨大而又深远的影响。

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毛泽东在首次公开宣布实行“一边倒”政策的同时，就明确提出：“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的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①随后他又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上强调指出：“要认真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无论共产党内、共产党外、老干部、新干部、技术人员、知识分子以及工人群众和农民群众，都必须诚心诚意地向苏联学习。我们不仅要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而且要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我们要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学习苏联的高潮，来建设我们的国家。”^②

20世纪50年代中国全面学习苏联的途径是很多的。其中，比较主要的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采取各种方式，广泛介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和各方面的先进经验，介绍苏联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社会进步的情况。二是强调向苏联专家学习。大批苏联专家来华，主要是直接帮助中国进行各方面建设的，但他们同时也是苏联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经验的传播者。三是派遣各类人员赴苏，直接到苏联去学习。其中，有短期的，主要是各界派出的访苏团体，通过较短时间的参观、考察来学习苏联的经验。50年代前期，中国所派赴苏访问的团体之多，涉及范围之广，都达到创纪录的程度；也有长期的，包括到苏联各个企业接受培训的工人、技术人员和管理干部，也包括到苏联各类学校学习的留学生^③。

学习苏联教育经验也是新中国初期全面学习苏联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共同纲领》明确提出，教育工作的重要任务是把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教育改造成为新民主主义教育，进而建设社会主义的教育。当时的现实问题是国家即将进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与文教建设阶段，而建设所急需的各种人才却是严重匮乏，因而高等教育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源源不断地为国家供应大批受过一定专门训练的人才。1949年12月，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全国教育工作的总方针，即以老解放区新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某些有用的经验，特别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3.

^②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266.

^③ 孙其明.评50年代全面学习苏联的运动[J].同济大学学报,1999(1):39.